

名家自述丛书

座。乌镇（我的家鄉）在清朝末年是高

業大鎮，人口有十萬，比縣城繁華，也比

縣城大，連好些封建文人，我也進過私

塾。一家塾，但父親嫌那個老師太冬烘，

只教母親教我。又，伊羅生說尼克松

七二年訪問北京時，我參加了宴會，這

是他弄錯了，這不是事實。晚上而煩

沈雁冰



我走过的道路

（下）

茅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K825.6
MD/1-2

名家自述丛书

我走过的道路

(下)

茅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目 录

一九三五年记事·····	1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46
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	95
烽火连天的日子·····	132
在香港编《文艺阵地》·····	176
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	216
新疆风雨(上)·····	250
新疆风雨(下)·····	295
延安行·····	338
在抗战逆流中·····	381
战斗的一九四一年·····	411
桂林春秋·····	448
雾重庆的生活·····	486
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	518
抗战胜利后的奔波·····	555
访问苏联·迎接新中国·····	598

附录

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并后记)·····	书 翰 陈小曼 641
---------------------	----------------

一九三五年记事*

一九三四年在动荡中过去了，我在年底写的短文《一年的回顾》中，比喻这一年文坛的斗争，“就好比练拳的人‘打沙包’。把一个一个扑上身来的‘沙包’打开去，正是拳术的进展，同样的，‘文坛’在荆棘满布，枭狐窥伺的路上挣扎，才是真正的往深处进展！”我还认为一九三四年文坛的另两个特点是生力军的进入阵地和新文体的出现。大批的生力军，“南方北方，新的青年作家不断地在新刊的态度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他们加入阵地，并没有大吹大擂，但是“他们不但帮着守住了原有的阵线，他们更推动阵线向前！”新文体就是“速写”，它应了时代的要求产生并发展了，这是一种能把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很快地反映出来的文体，犹如生力军进入阵地，来不及架大炮，就用白刃和手榴弹来交战！

我在这一年，也顺应了潮流，把写“速写”作为我创作的主

* 自本章起，系作者亲属根据作者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而成。本章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二月《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总第十八期），原题为《一九三五年记事——回忆录（十八）》。篇末署写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后编入《我走过的道路》（中）时删去副题与写作时间。

要方面。一九三四年我只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却写了十七篇速写和散文。这些文章多数登在《申报月刊》和《太白》上，也有登在《漫画生活》上的。我写的速写，有八篇是农村题材，如《大旱》、《桑树》、《阿四的故事》等。城市题材的有四篇，其中登在《水星》上的《小三》，是讽刺国民党那些走狗文人的，包括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里的检查老爷们。不过，我写的是大公馆里一个小厮的故事，检查老爷即使嗅出什么也无可奈何。在散文中，有一组文章可以提一下，即《雷雨前》和《黄昏》及其他，后者包括《黄昏》、《沙滩上的足迹》、《天窗》三篇。《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足迹》是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特别暗示：一九三四年虽然是国民党加紧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对革命力量大举“围剿”的一年，黑暗似乎更深沉了，然而涤荡一切污浊的暴风雨却正在酝酿，即将来临，长夜终将过去。《天窗》则向人们暗喻，国民党的文化禁锢政策，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我在一九三四年的另一重要活动。全年，我翻译了短篇小说十三篇，写了外国文学评介十二篇。翻译的小说都是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上半年的登在《文学》的“翻译专号”和“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下半年的登在《译文》上。后来我将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于一九三五年底作为译文丛书之一，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还亲自看了《桃园》的校样。从二十年代编《小说月报》开始，我就注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那时翻译的小说编了一本《雪人》，这一本《桃园》是我在三十年代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成果。

介绍外国文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为《中学生》写的一组通俗地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勒克特拉〉》、《〈神曲〉》、《〈十日谈〉》、《〈吉河德先生〉》、《〈雨果和〈哀史〉〉》、《〈战争与和平〉》。这是一组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中学生》杂志的编辑约我写这组文章，是因为见到《文学》、《译文》掀起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潮已影响到整个文坛，已经有人在称呼即将到来的一九三五年为“翻译年”了，他们也想趁这股风给它的小读者们提供一点这方面的精神食粮。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知道我有研究外国文学的兴趣，也知道我过去写过几本介绍西洋文学的小书，就找上门来。他们只要求我写得通俗一点，使中学生能接受。二十年代初期，我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内研读英文版的外国文学著作时，特别喜欢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写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因为他在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后，却是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文学史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作家的生平和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从而评论作品的特点，“宣传”自己的观点。读他的书，绝不会被罗列的史实和枯燥的说教弄得昏昏然，而是得到一次充分的艺术享受。所以当我看了《中学生》的约稿信后，脑子里首先闪过的念头就是：何不我也试试用勃兰兑斯的方法？选择若干篇能代表西洋文学发展史各时期的名著，以这些名著为中心，讲故事那样地把各该时期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及其作品，通俗地作一历史的鸟瞰。各篇可独立成章，但连贯起来又描出了一幅西洋文学发展的简图。于是我就动手写了第一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文章登出后，很受中学生、年轻的

工人、店员乃至大学生的欢迎。编辑先生向我报喜，又催我写第二篇。就这样，平均一两个月写一篇，直到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才登完。后来开明书店把这些文章集成一册，出了单行本，叫《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不过，这一组文章大部分是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严格地说，应该归入我一九三五年的工作中去。

我的一九三五年的工作仍旧是“打沙包”，不过一九三五年的“打沙包”是主动的，不像一九三四年是被动的多，并且“打”的范围也更广泛了。换句话说，一九三五年我仍旧未能把主要的精力用到创作上，而是打了各种各样的杂。

自从写完《子夜》之后，我已经是第二次许下了再写一个长篇的愿而未能实现了。沙袋一个个扑上身来，容不得你定下心来构思新的长篇小说大纲。我在一九三三年夏回乡为祖母除灵时，发现乌镇的老屋现在清静了，只住着我母亲和四叔一家。老屋后面那个有三间平房的小院，更见幽静。那平房自从曾祖父去世后再没有人住过，纸店曾用来做过栈房，现在则空着。我想，如果能躲到这里来写作，倒是个好主意，急事，他们一时找不到我，不急的事，他们也就不找我了。但三间平房已坍塌，需要翻修。我同德沚商量，她也同意，并补充道：“房子修好了，妈妈可以搬进去住，你那一堆洋装书，也可以搬一些到乌镇存起来，免得搬一次家受一次罪。”

第二年春天，我送母亲回乌镇，就把纸店的经理黄妙祥请来，同他商量翻修后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请来了一位

工程师，他把平房彻底检查了一番，对我说：“除了地基和房上的瓦还可以利用，其它的都要换过了。”他说：“这房子造了才三十年，时间不算长，坏就坏在它遭了白蚂蚁！”他用手里的一根铁条戳着柱子道：“你看这柱子外表蛮好，其实里面已经蛀空了。还有房后那棵白果树靠墙太近，树根伸到房基下面，把地面都拱起来了。这房子不能小修小补，只能重新翻造过，还要把白蚁窝找到，先治了白蚂蚁。”工程师这一席话，出我意料，我只好再与黄妙祥商量。黄说：“这房子本来就太老式，少爷来往是不适用的，要修就应当彻底翻修。譬如门窗要改成西式的，屋顶要换过，要铺上地板。不过不用打地基，造价比盖栋新的肯定要便宜不少。好在少爷要过两天才回上海，让我先去打听打听价钱，假使还合算，我们再商量。”他又凑近一点低声说：“现在造房子正是时候，木料便宜，砖瓦不值钱，承包商又都闲着。”我被他说活了心，就说：“只要造价不贵，新盖也可以；不过既然新盖，我就要按自己的意思重新设计。”黄妙祥说：“这个好说，只要定出几种主要用料的标准，譬如用什么木料，用什么砖，铺不铺地板，屋顶多高，其它的多一件少一件相差无几。”我考虑了一下道：“木料、砖要用好一点的，要铺地板，还要多开窗户。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过了两天，黄妙祥给了我回音，他说，几个承包商都看过了，他们出的价大致在五六百元之间。“不过，”他补充道，“招标之后，价钱还能压下来。”花五六百元盖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按当时上海的标准是太便宜了。而且我想，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几十年来都住在前面老屋楼上那间高不到二米的斗室里，应该让她在晚

年过得愉快舒适一些。母亲不愿长住在上海，怕增加我的经济负担，如果盖起这房子，母亲就可以住得宽敞些，空气好些，光线也充足些；小院里母亲还可以种些花草，也可以请个老妈子来陪她。我有时回乌镇写作，临时搭张铺就行了。于是我决心翻建这三间平房，并报告了母亲。我对她说：“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盖了这几间房，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房空着也不好，你就搬到那里去住吧。”母亲见我是为了写作而盖这房子，也就同意了。她说：“好在造价不算高，不过我还是住在前面楼上好，住惯了。”我想，现在也不必勉强她，只要她同意盖房就好。于是我就花了半天时间，画了一张新房草图。草图要求：朝南一面墙全部改成玻璃窗，西面一大间作书房和卧室，绕墙都是立地大书架，屋子中央立一两面可以放书的大书柜，代替隔墙把房间分为南北两间。中央一大间为客厅和起居室，屋中间用一排中式长玻璃门隔开。东边一大间朝南开门，前间是过道，后间是储藏室。这张草图送到乌镇的木匠师傅手里后，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在乌镇还没有人造过这样古怪的房子。不过乌镇的木匠师傅的手也是巧的，只要你能画出图样，他们就能做出来。我把盖房的一切事情都托付给黄妙祥，就回了上海。过了一个月，母亲来信说，黄妙祥请来一个治白蚂蚁的先生，把白蚁窝找到了，就在白果树根的下面，所以决定连白果树一齐挖掉。这样一来，就要增加壮工费若干云云。后来在建筑过程中，黄妙祥又陆续来了几封信，要追加费用，无非是原材料涨价之类的原因，我也只好一一照付。大概盖这栋房子，连同室内的家具

和室外的绿化，共花了近一千元。

一九三四年秋后，房子盖好了，我亲自去乌镇“验收”，也为了接母亲来上海过冬。黄妙祥陪我看了新房子，果然不错，尤其木工做得细致。室内光线充足，很合我的意。黄妙祥笑着说道：“镇上已经有不少人来参观过了，都说这是沈家大少爷亲自设计的洋房，要来开开眼界。”我也笑道：“这算什么洋房呀，不过还实用罢了。”这时候室内还没有家具，我就把布置房间，美化环境的任务交给了德沚。后来，那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德沚在上海、乌镇之间来回跑了几趟，从上海运去了一套沙发，十几箱书（其中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两棵扁柏，以及其它日用家什；在镇上定做了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以及床、柜等；又在长窗上挂上窗帘，配上了灯罩。在院子里，母亲移来了一棵夹竹桃，栽上了一枝藤萝，种上了花。这个小院四周都是高围墙，仅南面有一扇小门通往前面老屋，平时没有人来打扰，十分幽静，又经过这样一番布置，真有点“桃源胜地”的味道了。可惜我只在那里住了短短的两次，一次是一九三五年秋，有两个月，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只半个多月。

上面提到，有人称一九三五年为“翻译年”，所以要讲我在一九三五年的种种打杂工作，还是从译介外国文学讲起。

我在《中学生》上连续发表《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中各篇文章的同时，又在一九三五年初，在亚细亚书局老板的硬邀下，急急忙忙赶写了一本同类性质的书——《汉译西洋文学名

著》。书中简要地（每篇二三千字）介绍了三十二位外国著名作家的三十二篇已有中文译本的代表作。这是一本“急就章”。如果说《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中各篇我是花了力气精雕细刻的，那么《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就好像用炭笔勾勒了三十二幅草图。我对书店老板说，我只能写这样一本书，给初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粗浅地介绍一些基本常识，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又只能限定介绍已经有了中文译本的作品。这是一。其次，我手头没有这些译本，必须由书店提供给我，而且重复的译本也要找来，以便比较和选择。这两点书店都同意了，而且给了比较优厚的稿酬。当时各书店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书籍，竞争之下也就舍得花钱了。这种风气大概也促成了一九三五年之所以被叫作“翻译年”。

我写这本书虽说是“急就章”，但看书的时间却三四倍于写作的时间，因为必须浏览一下所有的译文。我是主张名著复译的，因为复译可以有比较，可以提高译品的质量。但是，当时杜衡他们反对复译，他们看见翻译事业又兴旺起来了，就冷言冷语地批评道：去年的译品是“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于第七八次的重译占据了相当的多数”，莫非西洋文学的宝库经我们几度搜刮就已经空了，所以不得不过来“炒冷饭”了？鲁迅对此是十分生气的，曾著文驳斥，提出“非有复译不可”。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翻译”和“批评”翻译》，登在《文学》四卷三号上。我说：“看那位批评者的态度似乎并没想正正经经‘批评’去年一年的翻译，不过随手抓得了一点，加以‘炒冷饭’的否定的讥笑而已。”“这种轻薄的批评态度，对于翻译界只是一枝恶意的

冷箭。”“讲到翻译的重复问题，我们以为应当用严肃的态度去讨论的。大凡重复的翻译，一种是有意的，一种是无意的。前者是已经知道某书已有译本，可是或者因为不满于那译本，或者是因为从原文与所转译之不同，而于是再来译一遍。”“‘五四’以来，新译的西洋名著固然有好的，但也有糟的，因而有意的重复翻译如果人力许可的话，简直是必要的！只有在轻薄的不负责任的论客眼中这才被目为‘炒冷饭’！”“就拿去年一年的翻译成绩来说，我们还没有看见多少重复的翻译。在百分比上恐怕占不到‘一’。那位批评者竟说是‘占据了相当的多数’，未免太勇于捏造事实。”“从这非事实的‘谎’里我们深感得去年一年来有意的重复翻译——所谓‘炒冷饭’，实在做得太少了。”

也是为了强调我之主张复译，我在写《汉译西洋文学名著》时，专门在每一篇作品介绍的后面，写上一段该作品已经有哪几种中文译本，谁翻译的，哪里出版等等。我的用意，一是告诉读者可以找这些读本来读，来比较；二是用事实来驳斥杜衡之类的复译反对者：中国移译、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就是经过了多次的复译，然后渐趋完美的。

在“翻译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这是三十年代继《译文》之后又一大型介绍世界文学的刊物。它有一半篇幅选载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品和不易见到的古本、孤本，另一半篇幅介绍外国文学名著。每月出版一巨册，四十万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从外表看像一本厚厚的精装

书。在第一册上开始连载的名著，中国古典文学有《金瓶梅词话》和《警世通言》，外国名著有鲁迅译的《死魂灵》，傅东华译的《吉河德先生传》和黎烈文译的《冰岛渔夫》；后来各册上又有李霁野译的《简爱自传》、梵澄译的尼采名著《苏鲁支如此说》^①等等。一册或二册登完的名作家作品就更多了。郑振铎的这个主意，是他辞去燕京大学的工作，回到上海后想出来的，并得到生活书店的支持，愿意出版。他的计划十分庞大，准备出若干集，每集又分若干册，而第一集就预计要出六十至八十册，这在中国确实是空前的壮举。振铎在《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中写道：“我们的工作，便是有计划的介绍和整理，将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献世界的文学名著于读者之前。我们将从埃及、希伯莱、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名著开始。《吠陀》、《死书》、《新旧约》、《摩诃巴拉他》、《拉马耶那》^②和《诗经》，一切古代的经典和史诗、民歌，都将给以同等的注意。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尤将特别的加以重视。荷马、魏琪尔^③的史诗，阿斯克洛士、沙福克里士、伏里辟特士^④的悲剧，阿里斯多芬士^⑤的喜剧，赫西俄德、萨福、品得、施蒙尼迪、贺拉斯、奥维

① 《苏鲁支如此说》 现译《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

② 《摩诃巴拉他》、《拉马耶那》现译《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罗摩衍那》(Rāmāyana)，系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③ 魏琪尔(Weijier，公元前70—公元前19) 通译维吉尔，古罗马诗人。

④ 阿斯克洛士、沙福克里士、伏里辟特士 通译埃斯库罗斯(Aiskuluosi，约公元前528—前456)、索福克勒斯(Suofukelesi，约公元前496—前406)、欧里庇得斯(Oulibidesi，约公元前485—前406)，系古希腊三大悲剧家。

⑤ 阿里斯多芬士 通译阿里斯托芬(Alisituofen，约公元前446—前385)，古希腊三大喜剧家之一。

德、卡塔拉斯、琉克里细阿斯的诗歌，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狄摩西尼、恺撒、西塞禄^①、琉细安的著作，乃至波卢塔^②的传记，无不想加以系统的介绍。这样，将形成一个比较像样子的古典文库。在黑暗的中世纪里，从奥古斯丁到但丁、薄伽丘、乔叟、维庸，伟大的名字也不少。各民族的史诗，像北欧的新老二厄达，德国的《尼柏龙根之歌》，以至流行于僧侣间的故事集（像《罗马人功勋录》），行吟诗人之作品，都想择其重要的译出。中世纪的东方，是最光明灿烂的一个时代。从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变文、戏曲的成就到波斯的诗，印度、阿拉伯的戏曲、小说，乃至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都是不容忽略的。印度的戏曲，像《薄婆菩提》、《加梨陀娑》，中国的杂剧，像关汉卿、王实甫之所作，都是不朽的优美之作品。如有可能，《一千零一夜》将谋全译。汉魏至唐的诗，唐宋的词，元的散曲，都将成为全集的式样。宋元话本将有最大的结集。《三国》、《水浒》、《平妖传》则将力求恢复古本之面目。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里，伟大的名字实在太多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蒙旦、弥尔顿、莫利哀，都是必须介绍的；而班得罗、高乃依、拉辛、拉封丹以至沙尔·奥洛、培根、马逻、阿利奥斯多诸人也必当在收罗之列。十八、十九世纪到现代欧美，诗歌和散文的选择是比较困难的工作。但歌德、海涅、拜伦、济慈、

① 西塞禄 通译西塞罗(Xisailu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与散文作家。

② 波卢塔 通译普鲁塔克(Pulutaka,46—120?),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

雪莱、波特莱尔、戈蒂叶、魏伦、马拉美、惠特曼、拉穆诸人的作品是必须译出的。小说乃是这两世纪的文学的中心。从斯威夫特、笛福、菲尔丁，到司各特、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艾略特、史蒂文生、斯托夫人、爱伦·坡、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斯汤达、乔治·桑、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克·吐温、欧·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诸人都将有其代表作在这文库里。近代戏曲的发展也是很可惊的；从席勒、博马舍以下像易卜生、比昂逊、白利欧、霍普特曼、苏德曼、鄂斯加、王尔德、辛格、高尔斯华绥、梅特林克、契诃夫都是要介绍的，至少得包括三十个以上的伟大的名字。近代的东方是一个堕落的时期。但中国仍显出很进步的情形。《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最可骄傲的两部大著作。戏曲家们尤多到难以全数收入。但尽有许多伟大的东西还在等待着我们去掘发。诗歌和散文是比较得落后。但我们将不受流行观念的影响，而努力于表扬真实的名著。这样浩瀚的工程，决不是一二年或三五人之时、力所能成就的。我们竭诚的欢迎学人们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五六年之间，将这工作的第一集，告一个结束。”（按：引文中原来多数作者名字是英文，为阅读方便，已将其译成中文。）郑振铎所说“三五人”，就包括鲁迅和我，他最早把他的上述想法讲给我们听时，我们就表示全力支持。鲁迅当即把他正在翻译，原来要给译文丛书的《死魂灵》的译稿，交给了振铎。可惜振铎这个伟大的计划只实行了一年，只出了第一集的十二册，就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种种原因而中断了。以后再也没有人，也

没有书店，有这样的气魄来继续这一工作。解放后，翻译和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的工作是由国家出版社来统一规划了。虽然未再采取“文库”的形式，但振铎的遗愿总算逐步地实现了，而且翻译介绍的范围也早已超出了振铎当年的那个计划。我所以在上面不惜篇幅地抄录振铎《发刊缘起》中的那些话，为的是使现在的青年人知道：早在五十年前就有振铎这样的先行者，为整理和介绍世界文学名著而含辛茹苦，提出了如此宏伟的计划。

不过，在《世界文库》刊行的当儿，听到的却并非全是称赞声。有的朋友就在鼻子里哼一声道：“这是什么世界？还干这些不急之务！”我在一篇题名《孟夏草木长》的短文中顺便回答了这种讥讽。我说：“‘文艺’的发展固然主要在‘创作’，可是世界文学之介绍及本国旧有文学之整理亦对于‘文艺’的发展尽了帮助。因而像《世界文库》那样的大计划的定期刊，它的意义和作用也就不便估量得太低了。”又说：“对的，我们的急务甚多，然而急务势不能办的时候，‘不急之务’犹胜于不务；何况也未必竟是不急之务，至少比‘朋友文学’有意义了不知多少！”所谓“朋友文学”是指当时冒出来的一种不为社会所需要而只为阿毛阿狗自伙淘里需要的“文学”。

也有借《世界文库》的出版而喊冤的，这是施蛰存。一九三四年施蛰存曾因主张青年人读《庄子》、《文选》而受到鲁迅和我的责难。现在他在《世界文库》的目录上“赫然看见了《庄子》与《颜氏家训》这两个书名”，就觉得去年受了“委屈”。他写文章道：“哦，去年在我手里倒了霉的《庄子》与《颜氏家训》，

今年倒在别人家里走起红运来，成为‘不得不读之重要名著’了。”而“去年反对读《庄子》与《颜氏家训》的人，今年却荣任了《世界文库》的特约编辑委员，当然也承认它们是‘不得不读之重要名著’了。”这后一句话就是讽刺鲁迅和我的。鲁迅读到这篇文章后笑着对我说：“去年的‘施公案’今年要翻了。”我说：“让我来回答他罢。”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又是〈庄子〉和〈颜氏家训〉》，登在《文学》五卷三号上。我说：“《世界文库》拟目中列有《庄子》等三书，并且在说明‘凡不得不读之重要名著已略备’，这是事实；但这事实却帮助不了施先生‘冤狱’之平反。为什么？因为第一，《世界文库》的目的在用最经济的手段使研究文学的人们得备一部不得不读的世界重要文学名著的汇刻。‘拟目’中所列各书都是按照时代由古及今，每一时代的重要著作酌量先刊其一二。《世界文库》是一个小小的文学图书馆的计画。《世界文库》并不单单拈出《庄子》等三书请青年们去‘必读’。《世界文库》倒是用‘圆本’的方法大批介绍古书让研究文学的人们去研究。《世界文库》的目的和施先生去年的主张完全是两件事，两副眼光，两种用意。而第二，《世界文库》的说明中并没有说《庄子》等三书可以帮助文学青年们学得什么作文方法和‘词汇’。所以即使像施先生说的‘去年在我手里倒了霉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今年倒在别人家里走起红运来’，这也只能怪施先生自己当初把《庄子》和《颜氏家训》捧得不能适如其份——施先生不能从历史的价值去估量这三部书，却要请它们来作帮助现代青年解决作文方法和丰富‘词汇’的法宝，——以致‘倒了霉’，《庄子》等三书在施先生